

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

(1948—1960)

爱德华·塔波尔斯基著

(供内部参考)

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

(1948—1960)

爱德华·塔波尔斯基著
何瑞丰 徐式谷譯

(供内部参考)

Edward Táborský
COMMUNISM IN CZECHOSLOVAKIA
1948—196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61

根据美国普林斯頓大学出版社 1961 年英文版譯出

• 供 内 部 参 考 •
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
(1948—1960)
〔捷〕爱德华·塔波尔斯基著
何瑞丰 徐式谷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資料室編印
(北京后圓恩寺 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0 $\frac{5}{8}$ · 字数 488,000
1965 年 7 月第一版 1965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 · 754 定价(五) 2.70 元

序

从 1948 年 2 月共产党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夺得政权以来，到今天已經有十二年了。在它进行統治的这最初十二年中，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权安然度过了这样一些决定命运的事件，像捷共所效忠的約瑟夫·斯大林的去世、斯大林死后危险的“解冻”时期、1956 年匈牙利和波兰的政治动蕩等等。据 1960 年的新宪法說，社会主义已經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胜利，人剥削人的現象已經消灭，劳动人民“正在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蓄积力量”。

照这样看来，向最終的共产主义太平盛世迈进的最初阶段已經結束，因此，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考察和估价一下这个阶段的政治成果。在改造这个一度被称为中欧民主堡垒的国家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取得了多大成就？他們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宪法、政治和社会政治結構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許下的增进社会正义、平等和真正的“人民民主”的諾言——构成馬克思主義教条最动人心弦部份的諾言？到目前为止，他們那超过資本主义生产能力 and 达到世界最高生活水平的雄心壮志實現了多少？在实现他們所宣布的消灭人剥削人現象的目标方面，他們做了些什么事？他們在思想方面的巨大努力，即企图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Weltanschauung*（世界观）的形象来塑造一个深深浸透了西方民主的思想和观念的民族的心灵，究竟取得了什么結果？

不言而喻，要对这些以及其他关系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实验成敗的問題作出最終答案，十二年实在是一段太短的时期。但

我們至少可以根据這段時間作出一個暫時性的估價，特別是考慮到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人早在 1945 至 1948 年就能夠進行很多準備工作的事實（他們以及他們的同路人當時把持了費林格和哥特瓦爾德內閣中的大部份重要職位），我們更有理由這樣做。

在某種程度上說，研究捷克斯洛伐克也許比研究莫斯科的其他任何衛星國都更有價值。在被併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以前，它在這些國家工業化和都市化的程度最高、農業和鄉村的比重最小。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捷克斯洛伐克就有了若干由中央、各省和地方政府經營的公有企業。合作社運動具有悠久傳統。一般民眾對政府干涉工商業沒有任何明顯的反感。即使在私人企業家當中，依靠國家給予支持和補貼也已經蔚然成風。慕尼黑事件發生前，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一直完全享有鼓吹共產主義事業的自由，而在戰前的東歐其他地方，共產黨一般是得不到這種自由的。共產黨自 1921 年成立後一直是全國最大的四大政黨之一。到 1945 年，幾乎所有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人和很多知識分子都把社會主義當成了解決大部份經濟問題的萬應靈藥。親俄情緒——即把俄國看作防止新的德國侵略的主要保護者——在一切階層中都有了相當廣泛的發展。宗教信仰如果非常根深蒂固的話，一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人們受共產主義的影響，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除農村地區外，宗教信仰是相當淡薄和肤淺的。

總起來看，這一切因素都傾向於表明，在莫斯科的所有衛星國中，捷克斯洛伐克似乎為馬克思主義制度的順利建立和運行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換句話說，如果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真的能夠在實踐中表明它比西方的民主制度優越，那麼，捷克斯洛伐克就理當成為證明這一點的一個適切國家。事實上，如我從切身經驗中所知道的那樣，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許多領導人所以會覺得捷克斯洛伐克注定要成為一個模範的共產主義國家，其原因正在

于此。近年来，苏联领袖实际上也在把捷克斯洛伐克当做一个模范的、想要它充当共产主义展览橱窗的人民民主国家。

另一方面，除去以上谈到的一点肤浅的亲俄情绪以外，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都一直是肯定地具有西方倾向和西方心理的。他们的哲学、政治和文化传统牢固地植根于西方文明之中；他们在一切人类努力领域中的领导者，都一直以西方而不是以东方作为启发自己的源泉和效法的榜样。

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表明了一种悲剧冲突，即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诱人诺言和苏联指导下的极权主义的严酷现实之间的冲突，也是一种多半会导致它的整个大厦最终倒塌的冲突。同时，由于它过去曾经被誉为东欧最有效的民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也比任何一个别的苏联卫星国都更为生动地表明，当一个具有西方倾向的民主社会陷于马克思主义的极权统治之下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本书分成四部。第一部介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下简称捷共）以及追随它的一些“非共产主义”政党。这一部先扼要叙述一下1948年以前捷共的历史发展情况，接着说明该党取得政权后发生的变化，然后再分析和介绍其组织和工作方式、领导集团的性质和结构以及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二部讨论的是名义上的政府。这一部研究了五九宪法的独特性质（在从1948到19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阶段，这部宪法一直起着根本法的作用），考察了苏联版的1960年新宪法带来的主要变化，并且分析了共产党政权“引带”的精巧结构。第三部专门分析经济发展情况，力求从生产成果、人民福利和人的代价的角度对这种发展作出估价。第四部描绘了共产党为使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作的努力，在捷克斯洛伐克，正如在铁幕背后的其他地方一样，共产主义实验的最终成败就要取决于这种努力。最后一章

总结了本书的主要結論，并且簡短地估計了未来的发展前景。

全书的重点始終放在主要发展趋势和工作方式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理論家們提出的一些概念也受到了注意。不过，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在他們的著作和談話中只是重复苏联提出的和苏联解释的論点，我认为沒有必要让本书过多地充斥着这类意識形态的衍生物，它們很少有助于人們正确了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最主要的是，我們在判断一切地方的共产党人时，必須以他們实际所做的事，而不是以他們标榜的事为根据。

本书討論的时期从 1948 年 2 月共产党夺得政权时开始，一直到 1960 年年底为止，从而包括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統治的头十二年。不过，在一切必要的地方，仍然解釋性地提到了 1948 年以前的发展情况。

資料来源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本身印行或贊助出版的文件、书籍、期刊以及其他材料；第二类是得自非共产党或反共产党方面的情报，包括同捷克斯洛伐克逃亡者的談話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境內地下組織的報告。不用說，这两类材料經常是矛盾的。因此，捷克斯洛伐克事务的研究者便面临着一項极艰巨的任务：他必須从大量的宣传材料中一点一滴地拼湊出事实真相。由于存在着这种困难，加上捷克斯洛伐克現政权处处保密的著名特点，有时根本不可能給本书提出的某些問題找到可靠的答案。不过，当問題的性质或重要程度不容許我們完全不作答复的时候，我至少总是根据所能得到的部份文献进行了一些推測。

在結束这篇序言时，我希望向得克薩斯大学政治系、历史系和經濟系的同事們致謝，感謝他們就本书的語言和风格問題提出的宝贵意見。我还希望向自由欧洲委員会表示感激，該委員会准許我利用了它的档案以及它那些內容极为丰富的出版物和文摘，例

如《捷克斯洛伐克新聞》(*Zpráva o Československu*)、《捷克斯洛伐克概況》(*Československý přehled*)、《捷克斯洛伐克通訊》(*Československý zpravodaj*)和《東歐》(*East Europe*, 前身是《鐵幕後的新聞》[*News from Behind the Iron Curtain*])等。我特別感謝自由歐洲委員會的巴維爾·科貝爾博士，他閱讀了我的原稿，提出的寶貴意見使我得益匪淺。最後，我還要向得克薩斯大學研究院和約翰·西蒙·古根海姆基金會深表謝意，多亏它們給與的研究津貼才使本書得以寫成。

愛德華·塔波爾斯基

1961年2月于得克薩斯州

奧斯丁市得克薩斯大學

目 录

第一部 共产党及其民族阵线中的伙伴

第一章	作为革命武器的共产党	1
第二章	作为权力工具的共产党	22
第三章	党组织	46
第四章	党内行动准则的理论和实践	71
第五章	统治寡头	103
第六章	让共产主义头痛的各种“主义”	128
第七章	民族阵线中的伙伴	156

第二部 名义政府的引带

第八章	宪法体制	175
第九章	行政引带（一）：理论基础和组织	195
第十章	行政引带（二）：工作方式	215
第十一章	橡皮图章式的立法机构	243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法制	283
第十三章	地方杠杆	321
第十四章	斯洛伐克——一个古怪的地方政权单位	348

第三部 在产量上超过资本主义

第十五章	工业的挑战	365
第十六章	农业的毁灭	402

第十七章 人所付出的代价 448

第四部 締造共产主义新人

第十八章 树起一道隔絕西方影响的铁幕 497

第十九章 教育武器 536

第二十章 向成年人灌輸思想 584

第二十一章 結論和展望 634

第一部分

共产党及其民族阵线中的伙伴

第一章

作为革命武器的共产党

“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质上是它的先锋队‘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基本领导力量‘专政’。”^①严格遵循约瑟夫·斯大林亲自阐述的这一条共产党极权主义的基本准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在1948年二月政变中一打垮他们的民主对手，便立即垄断了全部政治领导权。虽然政变前的非共产主义政党经过清洗以后，除一个以外全都被允许继续存在，但它们只是做样子的摆设，地位朝不保夕，它们的存在丝毫无损于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及其助手建立起的地地道的一党专政。因此，既然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名义上的政府机构只是忠实执行党的决定的仆从，本书从分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着手也就不失为一种适当的做法。

捷共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或没有能力）进行统治呢？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的实际工作情况如何？它真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吗？党的控制范围有多大，它同一般群众是什么关系？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结构有多么巩固？它如何经受了斯大林死后发

^① 约瑟夫·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5页。

生的震蕩？使它头痛的主要問題和難处是什么？哪些是它的力量和弱点的主要根源？这些就是开头几章中打算討論的一部份問題。可是，在开始回答这些問題以前，我們先要簡短地追溯一下党的起源和它在1948年以前的主要发展情况。

起源和初期活动：1921—1938年^①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使得工人阶级有了一个领导自己的党，这个党光荣地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它高举着国际主义的旗帜，维护同苏联的友谊，……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和1921年夏天亲自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弗·伊·列宁，对于捷克斯洛伐克革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切复杂的和引起争论的问题的解决，都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②

从官方的捷共简史（这本书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相当于苏联的《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中摘出的以上这段话，准确地反应了捷

① 关于1948年2月以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历史，可参看 *Přehled dějin komunistické strany Československa*（《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简史》），捷共党史研究所1957年在布拉格出版的一本书；Jan Křen, *Československo v období dočasné a relativní stabilisace kapitalismu 1924—1929*（《1924—1929年资本主义暂时相对稳定的捷克斯洛伐克》），Praha, 1957；Václav Kopecký, *30 let KS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三十年》），Praha, 1951；Pavel Reimann, *Geschicht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r Tschechoslowakei*, Hamburg-Berlin, 1929。属于这一时期的文件主要可以在捷共党史研究所出版的两部文件集中找到，它们是：*V bojích se zocdila KSČ*（《捷共在斗争中壮大》），Praha, 1956，以及 *Za svobodu českého a slovenského národa*（《为了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的自由》），Praha, 1956。不过，文件集的编者自己也承认，他们没有收入“片面性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如果不加上详细的注释，便不能为人们正确理解。”

② *Přehled dějin komunistické strany Československa*, 第86页至87页。此后引用时简称为 *Přehled dějin KSČ*。

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主要特点，即对于克里姆林宫的依赖和百依百顺。从1921年成立以来，在它历经兴衰的整个时期，捷共一直都毫不动摇地遵循着莫斯科制订的政策，随时按照克里姆林宫的心意改变路线。充分利用托·加·马萨利克●民主政权特有的广泛政治自由，共产党人在全国建立了一套党支部和其他单位的组织网，并且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合作社、体育团体和其他机构。在不受任何检查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他们创办了一份发行量巨大的党报，这份报纸是共产国际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喉舌，它日复一日地、不断地恶毒攻击民主力量的领袖和新生共和国的代议制机构。按照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界革命战略，只要有助于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总是尽一切可能煽起政治罢工。“针对你们的法西斯警察恐怖，”哥特瓦尔德于1929年12月2日在捷克斯洛伐克议会中说，“我们将实行无产阶级自卫。”①共产党挑起工人和警察发生冲突，并且充分利用由此引起的几次流血事件进行宣传。②在议会豁免权的掩护下，共产党议员尽一切可能妨碍和瘫痪国民议会的工作，有时候甚至采取殴打对手的方法，同时利用议会作为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方便讲坛和共振板。③

苏联在三十年代中期改变政策以后，捷共也马上跟着采取了“新方针”。前些年的煽动性革命口号这时缓和下来了，以前被共产党目为头号恶棍的“反复无常的改良主义领袖”，现在成了建立

① 1935年12月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译者

② 1925年4月3日和6日、1931年6月4日《红色权利报》，*V bojích se zocelila KSC*，第290页以下。

③ 1925年4月6日《红色权利报》，*V bojích se zocelila KSC*，第127、130页；1931年6月4日《红色权利报》。

④ 他们特别习惯于在进行质询时提出这样的要求，例如严厉处罚干涉“工人权利”的警察、把牧场分给小农、缩短工作时间、禁止徒工学校晚间和星期日上課、降低关税等等。参看*V bojích se zocelila KSC*，第9、18、26、79、91和109页，以及*Přehled dějin KSC*，第134页。

統一戰線的爭取對象。“我們建議一切社會主義政黨聯合起來，共同向飢餓、法西斯主義和戰爭作鬥爭，”捷共中央在 1933 年 3 月寫給捷克斯洛伐克和蘇台德日耳曼社會民主黨和捷克斯洛伐克社會黨執行委員會的信中這樣說。^①“只有人民陣線才能保護共和國，”哥特瓦爾德在 1936 年 12 月這樣宣布。^②

雖然共產黨從沒有加入過聯合政府，它確實改變了以前的搗亂策略，轉而支持政府在日益嚴重的法西斯威脅面前加強國家力量的努力。在年輕共和國的歷史上，共產黨議員於 1935 年第一次投票支持民主力量的總統候選人愛德華·貝奈斯，從而放棄了他們以前的一貫做法：在此以前，他們總是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即使他們明知道沒有任何機會擊敗捷克斯洛伐克的喬治·華盛頓——托·加·馬薩利克。當捷克斯洛伐克問題所引起的國際危機在 1938 年夏秋兩季達到高潮的時候，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人也主張對希特勒作戰，反對接受英法的最後通牒。雖然他們採取不妥協態度的原因主要是奉了莫斯科的指示以及為將來的革命作打算，而不是維護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獨立，哥特瓦爾德及其同事以後却得以利用他們在慕尼黑事件中的表現撈到了一笔可觀的政治資本。^③

在所有這些年代中，儘管它的策略路線變化無常（這表明了它

① 1933 年 3 月 16 日《紅色權利報》，*V bojích se zocelila KSČ*，第 321 頁以下。

② 1936 年 12 月 1 日在議會中發表的演說。*V bojích se zocelila KSČ*，第 453 頁以下。並可參看 1935 年 3 月 31 日《紅色權利報》，該報鼓吹舉行一次五一節聯合示威；捷共中央 1936 年 12 月通過的要求統一工會的決議；1936 年 12 月 16 日《紅色權利報》；1937 年 7 月 27 日《紅色權利報》；*Příkled dějin KSČ*，第 140—141、150、155 頁。

③ *Za svobodu českého a slovenského národa*，第 58 頁以下、99、114 頁。以後引用時簡稱為 *Za svobodu*。並可參看 *Příkled dějin KSČ*，第 169、173 頁；Dana Adams Schmidt，*Anatomy of a Satellite*，Boston，1952，第 249 頁；Hubert Ripka，*Le Coup de Prague*，Paris，1949，第 4 頁。

对克里姆林宫的忠顺)，捷共始终是全国最强大的四个政党之一。它在1925年获得最大成就，那一年，它参加了退出社会民主党以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得到九十四万三千张选票，在议会的三百个席位中取得四十一席。这样，它便跃登第二位，仅仅以五席之差居于最大的农民党之下，比同它争夺工人选票的主要对手社会民主党多十二席。^①四年以后，由于它那套蛊惑人心的手段和没有成果的否定主义不再吃香，它获得的选票几乎减少了二十万张，在议会中的席位降到三十席，从而比它的社会民主党对手少了五席，和最大的农民党整整相差十六席。由于三十年代的经济不景气，加上捷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民阵线时期改变了做法，从过去的坚持捣乱变为比较合作，这使得它在慕尼黑事件以前的最后一次大选即1935年的议会选举中稍有好转，在八百二十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二张选票中获得八十四万九千票，即占全部选票的10.3%。不过，由于选民总数从1929年以来有了增长，它在议会中的席位并没有增加。^②

虽然从政治代表权的角度来看，两次大战之间的捷共是苏联境外最强大的共产党之一，人们却不应该忽视下列事实：即使在它的成功顶峰，它获得的选票也只占选民总数的13%，而党员的实际人数则在最高数字十五万（1928年）和最低数字二万八千（1930年）之间起伏不定。而且，它的选民当中只有一小部份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大部份党员之所以拥护党，是因为他们真诚相信党的领导在为他们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在努力争取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就业和提高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在马克思列宁

① 另一本拙著列出了选举结果的统计表，见Eduard Táborský, *Czechoslovak Democracy at Work*, London, 1945, 第85页。

② 这里的数字引自 *Statistická ročenka republiky Československé*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统计年鉴》), Praha, 1937, 第279页。(此后引用时简称为 *Ročenka*)

主义的全部教义中，他們所关心的只是工业国有化，他們满怀希望地把这当成了医治一切社会弊端的万灵药。許多工人所以加入了党的队伍，主要是由于体力劳动者和白領职员之間傳統地存在着森严的社会壁垒——战前欧洲許多地区的社会激进分子得以利用的社会疏远和阶级对抗情緒，主要是由这道鸿沟造成的。

因此，捷共首先是由这样一些人組成的，借用列宁著名的話來說，这些人不仅不願意“把他們的整个生命……獻給革命”，甚至都不太乐意为革命牺牲一点“晚上的业余时间”。党拥有一批职业革命家，它的大部份領導成員都是莫斯科的应声虫。但是，在慕尼黑事件以前的整个共和国时期，这个领导集团从沒有能够使下层群众做出任何可以称之为革命尝试的事情。除去在共产党鼓动者得以利用的几次罢工和街头示威中扔过砖头石块以外，哥特瓦尔德所說的无产阶级自卫主要只是恶毒的咒罵，加上在几次議会开会时大打出手和扔墨水瓶而已。

捷共成立以后的头十二年当中，党内一直存在着派別斗争和个人傾軋。^①党的右翼态度比較溫和，主张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进行有限的合作，希望使党的战略适应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具体情况。党的左翼则坚决实行全面展开革命斗争的政策，主张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共产国际的特派代表德·曼努伊斯基的直接干预下，左派在 1924 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获得多数。当时，由共产党議員巴布列克领导的一个溫和派从党内分裂了出去，在 1925 年的議会选举中单独提出候选人名单，結果遭到失败。在未能取得任何議席之后，巴布列克派参加了社会民主党。1925 至 1928 年期間，围绕着党的战略問題发生了另一次更严重的冲突。波伦和伊雷克领导的改良派鼓吹一种比較緩和的

^① 关于这些斗争的片面性叙述，在官方的 *Příběh dějin KSC* 书里，随处可见，并可參看 *V bojích se zocidila KSC*，第 140 頁以下。

路綫，理由是資本主義穩定將持續一個較長時期，以暴力推翻資本主義的时机還沒有成熟，群众還沒有為採取決定性行動作好準備。他們的觀點遭到後來由克利門特·哥特瓦爾德領導的左派集團的劇烈反對。整個問題提到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上，左派得到國際的支持。由蘇聯共產黨人伊·古賽夫擔任主席的一個共產國際特別委員會，譴責波倫—伊雷克集團“使黨脫離了群眾”，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也以類似腔調發表了一封致捷共全體黨員的公開信。主要由於蘇聯的這種堅決干預，左派取得了勝利，哥特瓦爾德在1929年變成了黨的總書記（在此以前，他已被選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1929年6月，黨的中央委員會對所謂變節分子和取消派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清洗。結果，許多著名的黨員都由於反對捷共無批判地追隨共產國際和有害的僵硬政策而被開除。

可是，“右翼取消派”剛一被清除，黨的領導又遭到了新的指責——這一次是由相反的方向來的。以艾夫仁·弗里德為首的一個集團由於“對進行經濟鬥爭和某些黨內問題抱着錯誤的左傾看法”，在1929年後期攻擊黨的領導人不該讓黨的路綫為機會主義傾向所歪曲。^①後來，這些左派大部份都承認了錯誤，接受了捷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批評，然而約·古特曼的右翼集團則不是這樣，這個集團在1933年起來反對黨的領導並堅持自己的立場。結果，古特曼被開除出黨，其罪狀是把黨的人民陣線政策曲解為“革命態度和改良態度之間的妥協”，從而“以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方式投降了社會民主主義”。^②

因此，在慕尼黑事件以前的整個共和國時期，捷共的歷史一直有兩個特點，一是不斷對異端分子進行鬥爭，一是莫斯科為了支持自己的忠實追隨者而時時進行干預。

① *Přehled dějin KSC*, pp. 122—123.

② 同上，第142頁。